

# 试析成吉思汗祭奠的历史变迁

乌云格日勒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102)

**[摘要]** 成吉思汗祭奠是蒙古族祖先祭祀的流转与发展,本文在梳理成吉思汗祭奠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探讨了该文化现象延续至今的主要原因——黄金家族后裔历史记忆使然。纵观成吉思汗祭奠八个世纪的历史,它在人们追寻历史记忆目的下被推延,并在不同朝代赋予不同的记忆内容,直至形成鄂尔多斯地区的祭祀风俗。

**[关键词]** 成吉思汗祭奠;正统观念;历史记忆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06)03-0038-04

**作者简介:** 乌云格日勒,女,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

成吉思汗祭奠的历史变迁,与蒙古汗庭变迁史密切相关。古代蒙古族信仰萨满教,成吉思汗祭奠的形成建立在萨满教灵魂不灭和万物有灵观念之上。蒙元时期,成吉思汗祭奠作为祖先祭祀被推广,成为全体蒙古族共同祭拜的“总神祇”。元朝灭亡,元王朝的统治成为一种记忆,元朝后裔恢复前朝统治的愿望和挫败异姓人争权的雄心,使他们强化了成吉思汗——忽必烈系“黄金家族”后裔这一概念,并认为这一系才是正统。在此正统观念的推动下,忽必烈后裔重组并完善了成吉思汗祭奠,逐渐形成“成吉思汗八白宫”。明朝灭亡,清朝确立了统治地位,元朝残余政权解体,持续四百多年之久的蒙古汗廷统治结束,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汗权统治成为一种记忆。成吉思汗祭奠始终在一种历史记忆的追寻中被人们推行和延续,逐渐地形成了鄂尔多斯地区的祭祀风俗。

## 一、成吉思汗祭奠的形成

成吉思汗祭奠是自成吉思汗去世后所形成的文化现象。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途中病逝,后人对其施行了秘葬。成吉思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蒙古社会和蒙古人的命运。他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结束了蒙古高原部落间无休止的征战,创立了蒙古文字,将族属不同、社会发展不平衡、方言各异的部众统一在一个汗权之下,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共同体。可想而知,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去世,为当初的蒙古社会带来何等的震撼。“您像黄鹰一样飞去了吗?我的主上呵!您竟成为辚辚舆车的载荷而去了吗?我的主上呵!您果真撇下后妃子嗣而去了吗?我的主上呵!您果真抛下属众臣民而去了吗?我的主上呵!……您为使九色人众幸福安乐,而在六十六岁升天逝去了吗?我的主上呵!”<sup>[1]</sup>这是《蒙古源流》所记载的护送成吉思汗灵车时随行人员哭颂的一段话。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蒙古民众对成吉思汗之死的痛惜与悲哀。这一切源于成吉思汗的伟大业绩,人们将巨大的痛苦与哀悼寄托于对成吉思汗的祭奠之中。古代蒙古族信仰萨满教,人们以蒙古族特有的“鄂尔多斯”(元代译为斡耳

朵)祭祀方式祭奠这位特殊人物。<sup>①</sup>在广大民众心中,成吉思汗不只是一般的君主,他被传说,被建构,他不灭的灵魂成为古代蒙古人名副其实的佑护神而被人们祭祀。

成吉思汗祭奠是在其生前四大鄂尔多斯基础上形成并逐渐完善的。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载了成吉思汗去世后,遵照其遗言秘不发丧,平定西夏后在四大鄂尔多斯为他举行哀悼,后妃、诸王连续三个月从四面八方赶来哀悼祭奠的情形。<sup>[2]</sup>四大鄂尔多斯是成吉思汗生前居住和议定重大事项之地,有严格的护卫制度,分别处于成吉思汗四大妃子驻地。成吉思汗去世后按照蒙古族幼子继承父亲家业的习俗,拖雷继承了四大鄂尔多斯。成吉思汗汗权继承人选定之前拖雷任监国,根据成吉思汗遗言及属众愿望,拖雷发布了成吉思汗去世消息并组织后妃、诸王进行祭奠。拖雷是成吉思汗祭奠的发起人和最早管理者,四大鄂尔多斯祭祀是成吉思汗祭奠的最初形式。古代蒙古人认为,成吉思汗居住过的鄂尔多斯和他所用过的遗物,都吸收和依附着他的灵魂。因此,蒙古族灵魂观念基础上形成的鄂尔多斯祭祀,根本区别于中原汉地帝王陵墓祭奠。成吉思汗葬地,对外严格保密,周围由特派的一千户兀良罕人守护,是禁止人们进入的大禁地,人们无法在他的葬地举行祭祀,成吉思汗祭奠在四大鄂尔多斯进行。

## 二、成吉思汗祭奠的历史变迁

成吉思汗祭奠与一个名词——“鄂尔多斯”密不可分。“鄂尔多斯”即可移动的毡帐,是蒙古语“宫殿”之意。四大鄂尔多斯祭祀经蒙古帝国窝阔台、贵由、蒙哥等几任汗廷的继承,到元代忽必烈时期进一步完善,北元(明代)形成了包括成吉思汗四大妃子灵宫、成吉思汗遗物等在内的八个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八白宫”。

成吉思汗祭奠创始人拖雷死后,他的正妻唆鲁禾帖尼接管了包括封地和军队在内的家族权力。唆鲁禾帖尼生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子。母亲去世后,幼子阿里不哥继承了拖雷的家业,在与忽必烈的汗位争夺中失败后请降,1266年病死。

忽必烈时期是元朝发展的鼎盛时期,他统一南北中国,奠定

了今天疆域的基础,举农桑、扩屯田、修水利,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这为继承祖先祭祀提供了物质、政治、经济保障。因此,蒙古人祖先祭祀在忽必烈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完善。1292年忽必烈封嫡孙甘麻刺<sup>②</sup>为晋王,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归甘麻刺管辖。此后形成大汗坐镇大都,晋王镇守蒙古本土的惯例,成吉思汗祭奠管理被纳入朝政大事。可见忽必烈对漠北本土祖先祭祀的重视程度。忽必烈与汉地交往多,受汉文化影响大,参照汉地习俗在大都建立太庙,分八室供奉了也速该、成吉思汗、窝阔台、术赤、察合台、拖雷、贵由、蒙哥等人及其妃子。根据《元史·祭祀志》,祭祀以上四世祖先时由太祝(萨满)从也速该开始呼祖先名号、报祭祀时间、数献祭品,最后将剩余祭品向外抛洒。从这些记载来看,忽必烈在祭祀方式上完全遵循了蒙古族传统。忽必烈称汗于开平,1272年定都大都后开平升为上都。他在每年夏季离开大都到上都避暑,按民族习俗祭奠祖先圣灵,完全以祖先传统方式“洒马乳祭祀天地”,其隆重程度可在《元史·祭祀志》、《十善福白史》等蒙汉文史籍和外国游客的游记中得到证实。作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皇帝为什么如此重视并亲临上都隆重举行“洒马乳”形式的天祭?古代蒙古族信奉萨满教,朴素的萨满教信仰视自然万物均有灵魂,在野外进行洒祭是他们“讨好”自然神灵的最直接方式。然而当阶级出现以后,自然神灵出现了等级,天神“腾格里”成为人们至高无上的神,“汗权天授”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头脑。如同《蒙古秘史》的建构,成吉思汗先祖孛儿帖赤那“奉上天承运而生”,把祖先和永恒不灭的腾格里联系在一起,这样成吉思汗后代汗权继承的合法性问题得到解决。可想而知,在一个深受萨满教影响的世界,神威巨大的腾格里天神面前任何普通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只有那些“上天子孙”们不断向自己的先祖“天父”洒祭、献祭,不能违背天意的普通人们跟随这些“天之后代”而顺应天意,逐渐地这种祭祀方式走入百姓的祭祀和信仰生活,成为蒙元帝国时期最大、最普遍的祭祀方式而被中外史书记录下来。成吉思汗本人是个笃信萨满教的信徒,他对天崇拜的境地之高可从一些蒙汉史籍当中窥见。忽必烈的童年在祖辈和父辈萨满教信仰的熏染中度过,对他来说遵循祖规是天经地义之事,何况祖上留下来的这一“法宝”对于维护他的汗权统治具有绝对说服力。视天为“父”的蒙古族腾格里崇拜观念与祖先祭祀结合在一起,成为影响成吉思汗祭奠的最重要因素。

在忽必烈以后的整个元朝,统治者遵循其旨意,继承了他的祭祖方式与思想。忽必烈时期形成的大汗驻守大都、晋王坐镇蒙古本土并管理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祭祀的惯例,贯穿了元王朝。当元朝末代皇帝脱脱帖睦尔被迫离开大都时,大都、上都的祭祖思想和祭祖方式被传至蒙古高原。大举推行佛教,奉行政教并行的忽必烈固然受佛教影响很大,但当时的佛教传播仅限于皇室贵族之中,漠北作为成吉思汗出生地和威震东西方的发家之地,是萨满教信仰根深蒂固之地。上都、大都的祭祖思想与当地对成吉思汗的特有情感结合在一起,很快得到进一步发展。

净化,为形成真正的蒙古族鄂尔多祭祀打下坚实的基础。显然,在四鄂尔多基础上形成的八白宫“八”之数字,和大都太庙八室之“八”不无关联。

元朝被推翻,明廷为彻底消灭北元蒙古的残存力量,曾一度逼近漠北都城和林。蒙古贵族与明朝抗衡的结果,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却助长了异族封建主的迅速崛起。此时蒙古政权处于明廷和异姓强权的夹缝之中,极度困难,有关成吉思汗祭奠及其鄂尔多的消息被完全封锁,14世纪末期到15世纪初期的几十年中几乎看不到相关记载。<sup>[3]</sup>显然,蒙古汗庭采取的是借助鄂尔多的可移动优势,以秘密、移动的祭祀方式,在逆境中顽强保存并延续着成吉思汗祭奠。

蒙古政权的后退,为重组成吉思汗祭奠及八白宫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以下几点可以说明,北元前期是八白宫形成的关键时期:第一,根据《元史》和《史集》等记载,元代祭祀成吉思汗的地点有三个,即上面提到的大都太庙、上都和蒙古本部漠北四鄂尔多。蒙古政权蒙古本土,是这三地各要素相互融合的合理时机。根据笔者田野调查,现今成吉思汗祭奠中的萨满教残留和在祭祀仪式中的具体做法,说明八白宫的形成建立在三者融合基础之上。第二,出现在拉施特笔下和明朝所修《元史》当中的成吉思汗四鄂尔多和相关祭祀线索,此后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这正如达尔扈特人颂读的祭词和他们自己的解释,<sup>③</sup>称成吉思汗八白宫是“不出现于书本记载的绝密”。能够出现在异族人笔下的鄂尔多,为什么成为蒙文史书都不可记录的“绝密”?这和蒙古族祖先祭祀的“保密”传统密不可分,<sup>④</sup>但同时也与一个重要原因不无关联:当时北元政权的势力不足以保证成吉思汗祭奠的绝对安全,但前朝(元朝)历代汗廷倍加重视的成吉思汗祭奠也不可能就此消失,显然他们对祖先祭祀采取了新的措施。这些新的举措对外当然要严格保密,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于书籍记载了。第三,退回漠北的北元汗廷并没有放弃重振祖业的决心,相反他们每时每刻都想着恢复大元汗权。在明朝时期的蒙古大汗称汗号、建年号时多采用“元”或“大元”二字,这正说明了退居蒙古本土的元王室后裔始终坚持自己是元王朝合法继承人的思想传统。<sup>[4]</sup>这时完善祖先祭祀,利用漠北萨满教阵地和先祖成吉思汗在蒙古人当中不可磨灭的威信,是他们证明自己正统性的最有利的精神“武器”。此时完善成吉思汗祭奠,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第四,蒙古族游牧文化的鄂尔多、灵魂、翁衮偶像崇拜优势,<sup>⑤</sup>为长期身处大都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元裔子孙,提供了结合漠北四大鄂尔多祭祀,完善成吉思汗祭奠的借鉴经验。鄂尔多祭祀既适合游牧文化特征,更有利于随时应变人为因素对祖先祭祀的破坏,能够保证祖灵香火不断。第五,“鄂尔多斯”一词在明代汉籍中的出现,说明八白宫的形成早于此词出现之时。“鄂尔多斯”即鄂尔多的复数形式,是诸多鄂尔多之意,以管理八白宫的人众为主逐渐形成部落,鄂尔多斯成为部落名。<sup>[1]</sup>鄂尔多斯在《明实录》《九边考》等汉籍中以“阿尔秃斯”、“阿尔秃厮”等形式出现,清代以后译为“鄂尔多斯”。据明

人记载,鄂尔多斯人最早进入河套地区<sup>⑥</sup>的时间是1470年。河套地区在元代属山西行省延安路管辖,<sup>[5]</sup>1370年进入明朝版图,永乐以后废弃,成为空虚之地。<sup>[6]</sup>河套废弃之后蒙古人进入此地,鄂尔多斯部落的形成当早于明代史籍中该词的出现时间,而八白宫的形成至少不该晚于鄂尔多斯部落的形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成吉思汗祭奠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完善并延续,但从各个历史时期的背景来看,北元前期对八白宫的形成和完善起到关键性作用。

明朝时期的成吉思汗祭奠仍继承了元朝的晋王管理传统,八白宫由“济农”掌管。“济农”一词来源于元朝时期忽必烈所封的“晋王”,是汉语“晋王”的蒙古语音转,明代汉籍音译为“吉囊”、“吉能”等,清代以后译为“济农”。<sup>[1]</sup>济农相当于副汗的职位,在明代拥有执掌右翼之权,兼管八白宫,一般由大汗的儿子或兄弟出任。《蒙古源流》有一段形象的描述,充分说明了济农的权限与地位:上天有太阳、月亮二物,下土有大汗、济农二主。北元政权在成吉思汗祭奠管理上,不仅沿用了元朝“晋王”一词的名称,在管理方式和权限上也给予济农仅次于大汗一人之下的特权。这足以说明成吉思汗祭奠在蒙古汗廷中始终处于重要位置。15世纪前半叶,脱脱不花汗封胞弟阿黑巴儿只为济农,后来阿黑巴儿只之孙伯颜猛可孛罗忽继任济农。<sup>[1]</sup>伯颜猛可孛罗忽15世纪70年代曾在河套地区活动,不久被杀害。从此鄂尔多斯部被异族人控制,八白宫开始落入异族人之手,直至16世纪初,忽必烈后裔达延汗击败右翼异族封建主,夺其部众,重新统一蒙古本部为止。统一蒙古本部后,达延汗重振六万户,分左翼、右翼各三万户,自己坐镇左翼,派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出任济农,坐镇右翼,直辖鄂尔多斯万户。巴尔斯博罗特长子成为济农及鄂尔多斯万户的世袭领主,<sup>⑦</sup>从此八白宫管辖权重新掌握在忽必烈系黄金家族后裔手中,八白宫也最终固定在鄂尔多斯地区。

八白宫作为成吉思汗祭奠的总称,由八个白色的可移动宫帐组成。由于汗廷更迭和历史推移,八白宫内容不可能保持不变,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成吉思汗八白宫”逐渐成为成吉思汗祭奠的代名词。需要指出的是,伊西哈屯灵包曾作为重要内容被补充进去。“伊西哈屯”是对忽必烈母亲唆鲁禾帖尼的尊称,唆鲁禾帖尼在拖雷死后,艰难掌管家族,扶持长子蒙哥称汗,蒙古汗统从此转入拖雷一系。蒙哥称汗,为忽必烈家族成为汗统打下坚实基础。伊西意为“根柄”、“起始”、“源”,哈屯为“妃”,伊西哈屯意即“根之母后”。八白宫在重组过程中将忽必烈母亲灵包纳入其中且奉为“伊西哈屯”,而太庙八室中不涉及忽必烈一系的窝阔台、术赤、察合台、贵由、蒙哥等人及妃子的供奉均被取消,说明元裔重组成吉思汗祭奠的深远用意。

清朝,蒙古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大转折。1632年林丹汗在皇太极大军逼迫下西逃青海,经鄂尔多斯时将蒙古本部保留的部分供奉物留于此地。<sup>[3]</sup>林丹命额璘臣济农随其西行,额璘臣不从,林丹削其济农号,后被迫率众随行。1634年林丹汗故于青海,蒙古四百多年的汗廷统治结束。不久额璘臣率部返回鄂尔多斯归降后金。清初恢复了额璘臣的济农位,但此时的济农已

是名存实亡,仅限于管理成吉思汗祭奠的祭祀事务。1649年,清朝在鄂尔多斯施行盟旗制度,济农所属被编为郡王旗,额璘臣封郡王,并世代承袭。额璘臣从万户之主变为掌管一旗之王的济农,足以说明清王朝盟旗制度的意图,汗庭政权对蒙古人来说已成为一种记忆。清顺治年间,额璘臣将处于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境内的八白宫迁于郡王旗,从此八白宫定居郡王旗直至今日,逐渐形成伊金霍洛(意为主子的禁地)之地名。清朝,完善了八白宫管理,组成专司祭祀的达尔扈特人,形成一系列祭祀相关的规章制度。<sup>[7]</sup>达尔扈特人分大、小两大部,各分八大牙门图,<sup>[8]</sup>在达尔扈特组织结构中出现了大蒙古、元、北元时期重要官员的名称,这更说明蒙古汗权记忆开始体现在守灵人身上,通过这一方式寄托着对前王朝的记忆。清朝开始,成吉思汗祭奠失去了统治者证明自己正统性的政治意义,在民间生根开花,逐渐形成鄂尔多斯的地方习俗。

民国期间,鄂尔多斯及八白宫进入国民党政府管辖。1946年初,成吉思汗嫡孙奇忠义(34代孙)举行郡王旗札萨克即位大典,<sup>[9]</sup>成为最后一名蒙古族记名王爷和济农。1939年,八白宫为避开日本人争夺,在国民党军队护送下被迫西迁。西迁的八白宫(西迁的供奉物包括成吉思汗与孛儿帖宫帐、呼兰宫帐、成吉思汗黑纛)1939年至1949年供奉在甘肃省兴隆山,1949年后供奉在青海塔尔寺,直至1954年迁回鄂尔多斯故地。

1949年9月,奇忠义率领郡王旗起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伊金霍洛旗(郡王旗)第一任旗长。1956年,建立“成吉思汗陵”<sup>⑧</sup>,八白宫及鄂尔多斯各地供奉物集中到新陵,移动、分离祭祀的习俗变为固定、集中祭祀,游动祭祖八个世纪的鄂尔多斯蒙古族终于有了祭祀祖先的固定场所。但由于集中祭祀,祭祀传统以及达尔扈特人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造成成吉思汗祭奠的又一次重大变革。1985年,成吉思汗陵对外开放,异族人大量涉足,作为八个世纪的蒙古汗廷“秘密”向世人揭开面纱,成吉思汗祭奠与旅游业发生了密切关系。

### 三、成吉思汗祭奠中包含的历史记忆

成吉思汗在历史上的伟大业绩,在元、明时期甚至以后的蒙古人记忆当中是难以磨灭的。不难理解,成吉思汗祭奠的产生建立在蒙古人追忆这位伟人的朴素心理之上。然而,事隔八个世纪祭奠仍能够延续,近八百年来不断被完善,形成八白宫,形成“伊金霍洛”——主子的禁地,形成“成吉思汗陵”,这是令人深思的。回溯历史,成吉思汗祭奠曾在成吉思汗——忽必烈系后裔的正统观念推动下被完善和延续。成吉思汗以后的窝阔台、贵由、蒙哥等继承者不断对外征战扩张帝国版图,到了忽必烈时期虽然失去对帝国的控制,所建立的元王朝稳固、统一的政权是更大意义上的基业。但是,忽必烈不断对内、对外用兵,给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对元朝自身发展埋下隐患。元王朝灭亡后,元廷后裔不得不退回蒙古本土。

元朝的灭亡带来一系列反应:明廷想一鼓作气消灭故元势力,阿里不哥、窝阔台后裔甚至非黄金家族对汗位的窥视,元裔内部的自身问题等等。面对种种夹击,忽必烈后裔作为北元势

力的合法代表集团,该如何重振祖业?“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sup>[10]</sup>元裔为使自己的利益合法性得到承认,必须寻找这种“过去的形象”,而这种过去的形象便是成吉思汗的伟大业绩,忽必烈的伟大业绩,元裔必须让人们具有这个“共同记忆”。此时完善成吉思汗祭奠,能够在事隔三个世纪后唤起人们对伟大圣主的再次记忆,而在八白宫中添加忽必烈母亲的祭祀成分,能区分出所有成吉思汗子孙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即成吉思汗——忽必烈黄金家族后裔。元裔不仅需要鼓自己的勇气,而且须在更大范围内团结和凝聚更多蒙古人重振祖业。成吉思汗祭奠的完善把人们引向统治者旗帜下的共同记忆,这种记忆对他们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带来无形的力量。为此,元裔及其追随者们煞费苦心:八白宫定居鄂尔多斯后,为确保八白宫能被永远控制在鄂尔多斯,不惜虚构“古儿别勒只哈屯”之人而建构出“成吉思汗八白宫不过黄河”的传说;<sup>⑨</sup>不惜制造“历史”,创造出成吉思汗安葬鄂尔多斯的传说(衣冠冢安葬传说);为增加成吉思汗战鬪的威力与神秘性,传说黑纛是天降神物;<sup>⑩</sup>伴随成吉思汗祭奠产生的传说在鄂尔多斯还有很多。

八白宫曾是汗位继承人合法性的标志,是历代大汗的争夺对象。据记载,阿台汗、答言汗都在八白宫前即位,甚至异姓封建主脱欢、也先也是在八白宫前即位。<sup>[1]</sup>在蒙古人的观念中,八白宫神圣不可侵犯,根据出自达延汗后裔萨冈之手的《蒙古源流》记载,由于脱欢在八白宫前说了冒犯之话,受到成吉思汗在天之灵“报应”而死。<sup>⑪</sup>显然,这一建构代表了众多成吉思汗——忽必烈系黄金家族后裔的立场,在他们看来只有忽必烈系具有继承汗权的正统性,异姓人当权定要受到成吉思汗灵魂的惩罚。“保持记忆成为可能的那种联想,与其说是相似联想或接近联想,不如说是兴趣和思想的一致性。这并不是因为思想相同,所以我们能够唤起它们,而是因为这个群体对这些记忆感兴趣,从而能够唤起它们,所以它们在我们的脑子里聚集在一起。”<sup>[10]</sup>在北元政权范围内,统治者控制着绝对话语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达到他们所“感兴趣”的集体记忆。巴秃猛可是蒙古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收服右翼、统一蒙古本部、分封子嗣,剥夺了异族异系封建主对部落的控制权,重新恢复了大汗在全蒙古的统治。巴秃猛可即位后封汗号为“达延”。“达延”即汉语“大元”之蒙古语音译,经过元音顺同化调整后形成。<sup>[4]</sup>达延汗统一蒙古是众蒙古的人心所向,直接将“大元”冠为自己的汗号,可见明代蒙古人对前王朝的深刻记忆和黄金家族正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只靠观念意识的记忆,当然不足以延续成吉思汗祭奠八个世纪之久。保罗·康纳顿在谈到社会记忆的时候注意到,任何社会成员都会有一个建立在肢体性仪式上的共同记忆,他说:“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递和保持的。”“但是,纪念仪式只有在它们是操演的时候,它们才能被证明是纪念性的。没有一个有关习惯的概念,操演性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一个有关肢体自动化的观

念,习惯是不可思议的。”<sup>[10]</sup>清朝,失去汗权后的蒙古贵族,在清王朝允许的范围内完善了成吉思汗祭奠,祭祀仪式、祭规等进一步规范、制度化。由于济农权限的缩小,以济农为代表的蒙古贵族只能在祭祀祖先的仪式操演中寻求从前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成吉思汗祭奠更加完善了。成吉思汗祭奠有一套完整的祭祀仪式,是在历次完善中逐渐形成的,仪式分龙年大祭、虎年大祭、年祭、四时大祭(季祭)、月祭、日祭。几百年来,人们在追寻祖先记忆的观念基础上,参与仪式,思维观念和肢体仪式共存互生,通过仪式的反复操演,成吉思汗祭奠得以绵延。直至这种延续形成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的风俗,鄂尔多斯人带着这种“地方性知识”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后,经过几十年的维修与扩建,现今的成吉思汗陵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世界游人的到来。

[收稿日期] 2005-11-19

#### 注释

①乌云格日勒.成吉思汗祭奠的萨满教根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6.

②甘麻刺是忽必烈所立太子真金之子。

③达尔扈特人是成吉思汗守灵并专司祭祀的人们,在田野调查中曾听达尔扈特人说,成吉思汗八白宫是不可对外公开的秘密。一些仪式中达尔扈特们至今仍坚持这一传统,因而笔者在调查中受到一定限制。

④古代蒙古族祭祖时往往商讨和决定族内大事,因此形成了祭祖对外严格保密的习俗。

⑤笔者在《成吉思汗祭奠的萨满教根基》一文中对翁衮崇拜略有探讨。

⑥当初的河套地区包括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在内的广阔地域。

⑦“济农”这一封号在达延汗以后就出现了滥用现象,不少非巴尔斯博罗特后裔中也有称“济农”的人,这说明蒙古大汗已失去对各部的控制。

⑧成吉思汗陵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霍洛苏木境内,当地人简称“成陵”。

⑨传说大意: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后,杀西夏王夺其妃古儿别勒只哈屯。古儿别勒只哈屯不从,跳入黄河自杀。为此,成吉思汗极为懊悔,发誓再不过黄河。后人遵循其旨意,形成八白宫不过黄河的习俗。

⑩传说大意:一次战争中成吉思汗损失惨重,于是向天祈祷,结果“天父”开恩降下神纛哈日苏鲁锭(黑纛)。从此成吉思汗战时高举黑纛,百战百胜,所向披靡。

⑪《蒙古源流》第五卷。

#### 参考文献

- [1]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
- [2] 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M].商务印书馆,1985.
- [3] 赛音吉日嘎拉.蒙古族祭祀[M].民族出版社,2001.
- [4] 乌兰. Dayan 与“大元”——关于达延汗的汗号[J].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1.
- [5] 周清澍.从察罕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地区[J].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2.
- [6] 鄂尔多斯市《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 [7] 《成吉思汗八白室》编辑整理小组.成吉思汗八白室[M].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 [8] 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岱.成吉思汗祭奠[M].民族出版社,1983.
- [9] 奇忠义.末代王爺[M].新华出版社,1991.
- [10]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贺永泉]